

守护石窟寺中的“活文物”

——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古树名木保护实践

包珑钰 贾晨



蟠龙松



七松坪

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天龙寺山门前，一株古松虬枝盘曲、冠盖舒展，这就是被誉为“中华第一奇松”的蟠龙松。从东魏石窟开凿至今，它与山中石窟、寺院和林木共同经历了岁月变迁。距其不远的七松坪，7株古松依山而立，呈北斗七星状排列，相传为明代天龙寺第四代住持彻证和尚所植。

古树名木既是自然生命，也是文化遗产历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石窟、寺院遗址和山体生态环境整体保护，通过资源调查、日常管护、专家评估、生境改善和价值阐释，探索石窟寺遗产地古树名木协同保护路径。

2023年，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古树名木保护的通知》，将古树名木视为与文物建筑、石窟石刻、遗址墓葬等共同承载历史传统和文化内涵的“活文物”。这意味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的古树名木保护不能停留在一般绿化养护层面，而应从历史环境和景观的整体性出发，统筹树木健康、周边生境、文物安全和公众利用。

古树名木融入天龙山人文记忆

天龙山石窟位于太原市西南群山之中，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始凿于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持续营建，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随着石窟开凿和佛教活动兴盛，这里逐渐形成石窟、寺院与山林相互依存的格局。石窟造像、寺院遗址、山体植被和古树名木共同构成天龙山石窟寺文化景观。

天龙山古树名木主要分布在天龙寺和七松坪一带。根据2026年最新古树名木普查数据，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共有古树14株，其中油松12株、侧柏2株，估测树龄为300年至1500年。蟠龙松估测树龄1500年，胸围1.9米、冠幅18.2米，是其中树龄最长、形态最具特色的一株。七松坪7株古松中，4株估测树龄500年，3株估测树龄400年，树高多为16米至20米，构成具有代表性的古松群落景观。

古树与天龙山的人文记忆早已融为一体。明代“天龙八景”中的“虬松蟠空”所指即为天龙寺前的蟠龙松景观，明万历年间，驻守太原的晋藩潞安王胤龙曾题诗赞曰：“老干孤标香叶浓，阴森盘踞绿蒙茸。天功蜿蜒多神异，云雨空山从化龙。”明代张冕《天龙寺》诗中也有“门对虬松歇偃石，殿围龙柏倒撑丘”之句，反映出当时寺院周边以松柏为主体的景观格局。古树不仅见证了遗产地自然环境的演变，也参与了地方景观意象和文化记忆的形成。

从历史价值看，蟠龙松的生长年代与天龙山石

窟早期开凿时期大体相当。作为长期存续于石窟寺环境中的生命体，它记录着不同时期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信息。七松坪古松群存续数百年，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山地松林的空间形态，是认识明清以来天龙山山林景观格局的重要实物依据。

从生态价值看，古松古柏在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局部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石窟寺类文化遗产而言，山体植被、水分循环和局部气候条件还会影响石窟及周边环境的稳定。因此，古树名木保护与石窟本体保护并非彼此独立，而是文化遗产地生态安全体系中相互关联的环节。

从文化和社会价值看，松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坚贞、高洁和长寿，佛教寺院也历来重视依山建寺、建筑布局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天龙山现存古树以油松和侧柏为主，体现了传统山林文化对遗产地植物景观的长期影响。蟠龙松已成为天龙山具有辨识度的景观标识，七松坪则以古松群落及其承载的历史记忆，成为公众认识天龙山历史环境的鲜明景观载体。

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古树名木科学保护实践

以资源调查夯实管理基础

科学保护首先要摸清资源底数。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编制并执行《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古树名木保护方案》，系统登记古树的树种、树龄、位置、胸围、冠幅、生长势和周边环境等信息，建立“一树一档”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博物馆将日常巡查、健康监测、风险研判和保护复壮纳入统一管理，使保护工作由经验判断转向以档案信息为依据的分类决策。

资源调查不仅完善了古树名录，也为发现问题和跟踪成效提供了依据。2021年，位于七松坪东约50米、估测树龄300年的G198号油松在调查中被补充登记。针对其根部杂树较多、生长环境较差等问题，博物馆实施竞争杂树清理和生态护坡完善等措施，目前树势良好。此后，博物馆持续更新树势、枝干、根系、土壤和保护设施等信息，并将古树名木巡查与景区安全检查、文物环境监测相衔接，及时研判枯枝坠落、支撑失稳和树洞积水等风险，推动“一树一档”由静态登记转变为动态管理工具。

以专业诊断实施精准管护

古树树龄高，抗逆能力相对较弱，不同个体在树体结构、病虫害和根区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不能采用单一养护方式。2021年至2026年，博物馆依据古树健康状况分类施策：对蟠龙松设置护栏和支撑，对堵树洞，铺设树池透气材料，清理树干内枯死枝条，改善树体安全状况和根区通气条件；对天龙寺

禅堂院及大雄宝殿周边古树扩大根区保护空间，增加透气铺装，优化立地环境；针对叶片黄化、树势衰弱和油松落叶病等问题，开展枯枝清理、科学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古树树势良好。

为提高管护的科学性，博物馆定期邀请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所和太原市园林部门专家开展现场诊断，综合评估古树树势、病害隐患、支护设施和周边环境，并据此提出专项保护意见。专家评估与日常监测相结合，使古树保护形成“发现问题—专业诊断—精准干预—跟踪评估”的工作链条，推动管护方式由经验养护转向科学决策。

以生境协同推进整体保护

古树名木健康不仅取决于树体状况，也受到土壤、水分、伴生植被、游览活动和周边建设等因素影响。对于石窟寺遗产地而言，古树名木生境还与文物保存环境和历史景观完整性密切相关。因此，博物馆将保护范围由单株树体拓展至古树赖以生存的环境，统筹树木生长、文物安全、景观展示和游客活动。在七松坪，博物馆以7株古松及其生境为整体，统筹土壤水分、伴生植被和游览空间，减少人为干扰，避免植被过度竞争、草坪浇灌和土壤过湿对古松造成不利影响。在天龙寺区域，则针对古树紧邻建筑遗存的特点，协调根区改善、树池形式、支撑设施与周边空间，尽量减少保护措施对文物环境和历史景观的影响。由此，古树名木保护从解决单株树体问题，进一步拓展为古树群落、生境与文化遗产环境的协同维护。

统筹文物保护、生态保护和公众传播

蟠龙松的盘曲姿态、七松坪的古松群景观，以及古树名木与石窟、寺院之间的空间关系，都是公众感知天龙山历史环境的直观媒介。下一步，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将以古树名木价值阐释为基础，以公众参与为纽带，以长效管护为保障，进一步完善“石窟—寺院—古树—山林”文化景观保护与展示体系，推动古树名木保护成果更好地服务文化遗产传播和社会教育。

一是深化古树名木价值阐释。价值阐释不应只停留在增设说明牌，更应揭示古树名木与遗产地之间的内在联系。围绕蟠龙松，重点讲述石窟开凿、寺院兴建和“天龙八景”的历史记忆；围绕七松坪，系统阐释古树名木群落、地名形成与山林环境的关系；同时结合“一树一档”和保护复壮工作，介绍古树名木面临的自然风险、人为影响及相应保护措施，使专业保护过程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的文化遗产知识。

二是拓展公众参与渠道。通过专题讲解、研学活动和提示设施，引导游客认识踩踏根区、攀折枝干、在树池内堆放物品等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推动公众由景观观赏者转变为保护参与者。

三是健全长效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和科学管护体系，深化古树名木价值与生境研究，加强与园林、林草等专业力量的协作，并根据古树健康状态和环境变化及时更新档案，评估保护效果，形成可追踪、可检验、可持续的管理闭环。从蟠龙松到七松坪，保护工作的对象看似是一株株古树名木，实质上维护的是石窟寺遗产地延续千年的历史环境。唯有统筹文物保护、生态保护和公众传播，才能让这些有生命的文化遗产继续见证天龙山的岁月变迁。

(作者单位：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国保单位·古树名木

博物馆包容性与可及性建设

——以故宫博物院国际博物馆协会培训中心为例

谭梓欣

促进多元文明交流、联结各类群体已成为博物馆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增强包容性与可及性是当今博物馆发展的重要使命。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定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Museums Uniting a Divided World)”，凸显了博物馆作为桥梁的潜力，能够跨越文化、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分歧，促进全球社群内部的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可见，提升博物馆的包容性与可及性，才能充分发挥其沟通纽带的价值，以文明互鉴消弭隔阂，共建多元共生、和谐共融的人类家园。

故宫博物院作为重要博物馆与世界文化遗产地，每年吸引上千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前来参观，长期致力于推进博物馆包容性与可及性建设。国际博物馆协会培训中心(ICOM-ITC)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与故宫博物院三方联合共建，自2013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打破文化与地域边界，面向全球博物馆从业人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博从业者开展高品质培训，助力推动全球博物馆领域的国际交流与深度合作。国际博物馆协会培训中心培训班集结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博物馆的从业人员，为他们搭建相互学习、平等交流的桥梁。

人才之桥：打破地缘界限 促进交流合作

培训班每期招募约30位国内外学员，并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授课。培训班为期10天，除专家讲座外，还设置小组讨论、成果发表、遗产地考察诸环节。截至目前，培训中心已举办17期培训班，培训了包括我国在内的77个国家与地区的519名学员，其中国际学员273名。参与培训班的学员具有显著的跨地域特征，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包括发展中国家和亚太地区的文博从业者。这种物理空间的汇聚，打破了文化与地域壁垒，让不同国家、不同博物馆的从业者平等对话。培训班的授课专家来自全球重要文博单位及高

校，学员则涵盖博物馆馆长、业务骨干、青年学者等。培训期间，专家与学员展开深入交流，学员之间也建立起紧密的关系网络。通过培训班，学员们建立了真实且活跃的联结，促成馆际交流合作。

文化之桥：创造专业对话空间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培训期间的专业探讨聚焦于博物馆管理、藏品、教育、展览或特别主题，专家为学员带来前沿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案例，学员间也通过小组讨论和报告，分享各自所在博物馆的实践案例或遇到的问题。例如培训班专家从博物馆发展历史与新定义出发，阐释建设包容性博物馆的重要性和必然性。202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修订的博物馆定义中提及包容性和可及性，而在此定义的讨论阶段，“包容性”一词已被国际博物馆协会各委员会讨论和提及，提及率高达66%，排在“研究”“保管”“遗产”“教育”之后。可见，包容及建设包容性博物馆逐渐成为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研究方向。

此外，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包容性建设优秀案例也在培训班中被分享和探讨。例如，里约热内卢现代艺术博物馆为吸引社区居民、建设包容性博物馆，于周六早晨为街坊邻里举办早餐会。馆方在早餐会中了解居民的想法和观点，并实际应用到展览中，还邀请居民为博物馆观众讲解导览，并分享他们对展览的独到见解。该博物馆通过上述方法，吸引了更多的观众群体，打破低收入人群与精英化艺术藏品之间的藩篱，拓展了博物馆的边界。

无障碍之桥：残健融合 建立可及空间

为进一步提升博物馆无障碍服务建设，2024年

春季，培训班首次招收视障学员，并在为期10天的培训过程中提供必要的辅助，这是故宫博物院建设包容性、增强可及性的一次尝试。

视障学员在参与培训班期间主要面对两重障碍：一是出行、饮食等日常生活中的障碍；二是沟通及学习时，难以获取图片或纸本材料信息的障碍。为解决日常生活障碍，培训班会务人员事先了解视障学员的视力损伤情况以及使用的导盲工具。在安排学员往返中国的交通时，会务人员协助申请航空公司、机场及接送机的无障碍引导。安排学员住宿时，预订酒店中的无障碍房间。同时，会务人员在学员入住当天，带领学员了解房间结构及各类设施。为保障培训班期间视障学员的出行和饮食，特招募有辅助视障人士经验的志愿者负责学员的引导工作。为解决学员在沟通或学习中难以获取图片或纸本信息的问题，尽量减少图片、截图的使用，必要的图片文件辅以描述性文字以便理解，以纸本形式的会务材料皆以电子版形式提前发至学员。授课专家亦根据学员情况对授课材料及授课方式进行相应调整。

除此之外，视障学员还分享了自己作为博物馆策展人的独特视角。学员认为，具有包容性的博物馆应创造允许不同群体参与及对话的空间，通常为展览、教育活动或其他延伸形式。在策展时，包容性还体现在予以叙事主体足够的话语权，并将他们的观点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作为视障策展人，要尽量在展览中融入更多感官体验，使展览更易被观众接受。包容、可及让博物馆更加开放和多元，这是博物馆作为社会机构的责任，也是博物馆不断反思与完善的标尺。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博物馆拓展自己的边界，就将面对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需要包容更多群体。因此，提升包容性和可及性是博物馆需要一直努力的方向，没有止境。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文物故事

“猛安谋克”制由金朝创立，是一种独特的军政合一型基层管理体系。猛安、谋克是金代官名。《金史·兵志》：“其部长曰猛安、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军户，余同县令。”

猛安谋克官印是权力的物质体现，其留存数量多，呈现出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

分布偏于北方地区

根据考古发掘所获数据综合分析可知，中国境内至今为止已发掘并被记录的金代猛安谋克官印数量超出100枚，其分布特征明显偏于北方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土猛安谋克官印最多，排在其后的依次是山东省、河北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等金朝统治核心地带。相较之下，南方地区的出土记录十分罕见。

从地理分布来看，官印的出土地多集中在金朝的军事要塞、部落聚居地以及交通要道上，这与猛安谋克制度下的军民驻防和屯田戍边战略部署密切相关。女真发源地东北地区不仅部落繁多，而且驻军数量可观，留存下来的官印占到全国总数的六成之多，凸显其在金朝政权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反观华北地区，这是金朝在中原地区实施直接统治的核心地带，这里的官印大多用于管理归降的部族，并保障地方城池的安全稳定。

金代官印统一用铜铸成，其整体形态规整，主要以正方形印面为设计基础。这些官印的印台厚重，大多采用直钮的设计风格，在中心部位特意开凿穿孔，这样既方便佩戴和携带，又充分顾及实际应用时的便捷性和实用性，目的在于满足军政官员随军驻防以及流动办公的需求。

猛安官印的尺寸明显大于谋克官印，符合金朝官印等级制度的规定。金代官印长宽均为6厘米左右，比宋代官印的尺寸大，形成了一种具有明显金代特征的印章度量衡体系。印文全部用九叠篆书写，笔画呈回环缠绕状，结构紧密有序，字体厚重庄严。印体侧面和背面常刻画铭文，这些铭文包含诸多重要信息，比如铸造年份、负责铸造的机构名、印塞对应的行政级别以及有关官吏的编号等，铭文字体往往简练清晰，给后人提取重要研究信息提供了参考依据。

金朝有一套严密的行政经营体系，该体系经由猛安与谋克官印的等级划分而创建起层级清晰的组织架构，并制定出现范化的制度。从官阶体系来看，猛安属于从四品的军事行政长官，其职责是统管大概三千户的军事事务，所以其官印尺寸较大，材质也更好、更厚实；谋克则是从五品的职位，主要负责治理几百户的部落民众。按照职阶划分原则，猛安官印全面掌握辖区军事调动、税收征收、官员任免等重要事务，谋克官印侧重基层部落日常管理、社会治安维持和士兵招募工作，各项事务均要遵照猛安上级指示与监管。

官印背后的治理体系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两枚猛安谋克官印中可以提取出许多信息，例如“速刺谋克之印”铜印长6厘米、宽6厘米、高5.3厘米，印面为正方形，九叠篆阳刻“速刺谋克之印”，印背刻“大定九年九月，少府监造”，长方形直钮。大定九年(1169)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猛安谋克制度是女真统治金王朝的民族基础和军事基础，这一制度起源于黑龙江区域，猛安谋克的数量、名称、属地等问题一直是需要探讨的新问题，速刺谋克之印应该为黑龙江地区众多谋克中的百夫长印之一。

“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铜印长6厘米、宽6厘米、高5.3厘米，印面为正方形，九叠篆阳刻“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印背刻“大定十年六月，少府监造”，印侧刻“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印塞重吉猛安下”，长方形直钮。此印具有典型的金代官印特征。《金史·地理志》注释中记恤品路“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东北至胡里改路一千一百里，西南至曷懒路一千二百里，北至边界鞑可阿邻千二百里”。恤品路在今俄罗斯滨海地区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古城，恤品河是今绥芬河，此印的出处应当为金代恤品河一带，具体范围和归属地有待考证。

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和金代政权统治疆域的扩大，猛安谋克制不断发生变化，猛安谋克的分布和名称有助于我们了解北方少数民族融合情况。金代猛安谋克官印的地理分布凸显了彼时疆域开拓的战略安排以及边防体系的创建情况。驻防类猛安谋克官印大多集中在边境重镇，这类官印重点负责捍卫边疆安全，防止外部



“速刺谋克之印”铜印



“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铜印



“熟里斡母谋克之印”铜印

入侵，而在内陆地区出土的官印则更多体现出对地方社会事务经营和税收征收的重视程度。“边疆防御与内陆治理”的综合性治理体系，明显提升了金朝对北方领土的控制力，而且有效地稳固其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局面。

“熟里斡母谋克之印”铜印，长5.8厘米、宽5.8厘米、高5.2厘米，印面为正方形，九叠篆阳刻“熟里斡母谋克之印”，印背刻“大定十九年二月，礼部造”，印侧刻“熟里斡母谋克印，未先光未先”，长方形拱钮。该印造于金中期，大定十九年(1179)，印面文字规整，字口清晰，文字线条硬朗。“斡母”为古代地名，在历史记载中有金代的斡母城、元代的斡母站和明代的斡木城，“斡母”是少数民族语言发音，所以“斡木”和“斡母”是不同的译写。《辽东志》卷首《开原控带外夷山川图》中绘有斡莫河(斡母河的另一个译称)，该图显示斡莫河是一条不大的河。斡母城因位于斡母河畔而得名。“熟里”可能是地名，也可能是女真语对别的事物的别称。

历史更迭的见证

从年号和工艺特征两方面考虑，金代猛安谋克官印的发展可以明显区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太祖和太宗时期官印的铸造技术比较原始，印文的篆书写得比较随意，刻款内容简单又不一致，现存数量较少，这些官印保留了女真人早期手工制作的突出特点。到了世宗和章宗执政中期，金朝国势强盛，官印的形制表现出很高的规范化，大小一致，九叠篆字体已发展得很成熟，刻款信息详细又充实，由少府监统一负责铸造，这成了金代官印的典型之作。世宗至哀宗末年，随着战争持续不断，国家实力逐步下降，官印的铸造工艺开始下滑，所用铜料中的杂质变多，所以印体变得轻薄且极易磨损，印文也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还出现了没有官方刻款的官印，私铸和滥铸的情况愈发严重。官印形式发生改变，其质量也存在起伏，这种情况表现出金朝国力兴衰的历史走向。

进入金朝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官印滥发的情况越发严重，为奖励军功、维持边疆部落的关系，频繁设立猛安谋克建制，导致官印随意铸造，从而带来很多深层次的社会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其一，官僚体系由于官印滥发而变得臃肿，权力层级划分不明；其二，随着战乱增多，官印丢失、私自收藏、非法买卖频繁发生，中央政府对官印的掌控能力大幅下降，有些部落自己持有官印，从而引发地方割据局面。随着时间流逝，猛安谋克这种军事单位渐渐从游牧驻防转为定居屯田，于是官印的监管范围逐渐固定下来，不过这也造成了军民战斗力的下滑。更为关键的是，女真社会正在加快向汉化方向发展，官吏阶层开始效仿中原地区奢侈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重了基层社会的各种矛盾，致使本来用于巩固统治的有效制度慢慢失去自身的监管效力。

金朝灭亡之后，元朝实行了重大改革，其中就包含废除猛安谋克制这种独特的军政体系，而且对剩余的官印执行回收和销毁政策，只有少量得以留存于民间或者深埋于地下，成为历史更迭的见证。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是其独有的军政体系的重要体现，在历史进程中占据着非常关键的地位。这种官印的消失既表明该特定制度已经结束，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兴衰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